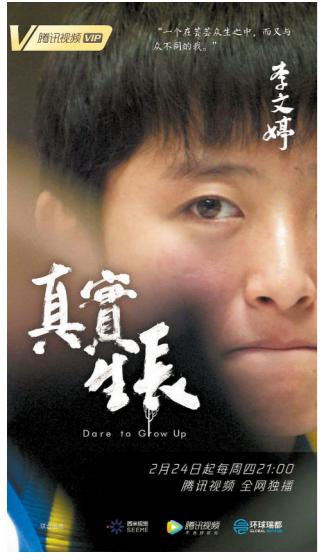




独家
专访

羊城晚报记者
龚卫锋



长线跟踪记录三位95后少年的成长历程,纪录片《真实生长》导演张琳: 他们都长成了珍贵的普通人

影像

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



导演阐述

“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”

羊城晚报:这部纪录片是如何起源的?

张琳:2010年7月,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正式发布。2011年,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。学校从2011年开始在部分班级实行走班选课,到了2012年,整个新生年级开展这次改革。一群教育线记者看到这所学校的改变后很震惊,发觉做一条新闻或电视专题报道,涵盖面太窄,便凭着热情和直觉通过纪录片来记录和观察这一社会变化。

羊城晚报:你们为什么会放弃《教育突围》这个最初的名字?

张琳:这场改革的确实是一场教育突围战,但我们做完5集片子后,很快意识到作为独立拍摄的第三方,无任何立场评判这次改革的成功或失败。2016年,走班选课制与导师制,已在北京市的试点学校逐渐推广开来,如果依然聚焦事件本身,会减弱片子的价值与

时效。项目被暂时搁置,团队也散了。不过,哪怕只剩我和发起人,我们依然保持同三个孩子的联系与拍摄。此时,我的身份也转变成导演,开始寻找有价值的主题重新串联素材。

羊城晚报:什么时候想到要调整主题方向了?

张琳:我带着纪录片去了鞍山、广州等地的业界活动。我经常需要用20字描述该片的重点,当时的表达是“在一所有中国顶尖的中学里,看到了理想的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鸿沟”。在广州纪录片节上,周浩导演挑中该项目,随后,腾讯视频也愿意作为投资方和播出方,项目终于回到正轨。

羊城晚报:所以,你的20字描述也发生了变化?

张琳:是的。我们决定将表达方向落在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上,那句话变成了“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”。“鸿沟”还在,但不再是整个故事的重点,它藏进了人物故事里。

“只有根系非常发达,才能不断向上生长”

羊城晚报:你还记得第一次进十一学校的场景吗?

张琳:第一次进学校是和老师联络拍摄的事。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周子其和他的三个死党毕业后回学校,再和李亮老师沟通、辩论的场景。学生的确长大了,李亮还要不断面对下一批孩子,并试图把不一样的理念传授给学生。他们已经能看到第一批以这样的模式走出来的学生的所思所想、人生轨迹。

羊城晚报:你们当时拍摄时会有类似剧本大纲的本子吗?

张琳:没有。纪录片导演要在拍摄现场隐藏自己,不让拍摄对象感受到他被拍摄,但不排除有些“人来疯”的孩子。导演会在每天拍摄前,告诉摄影师重点关注的方面,摄影师会在现场做分镜头脚本。我们在剪辑时厘清故事梗概,再进行一次分镜和组接。

羊城晚报:你们拍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,最后剪到只剩两个多小时,不可惜吗?

张琳:的确有很多观众反映,希望我们把拍摄的素材都放出来,但对于纪录片制作而言,拍摄本身只是过程,不是目的。很可能,讲故事的目的会在非常晚的时刻才能浮现。这同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角度有关。1000个小时的素材,换一个主题去剪辑,会是完

“把孩子当人看”一定是好的理念

羊城晚报:到这个学校之前,你的困惑是什么?现在找到答案了吗?

张琳:这样的教育模式我不在乎它能不能推广,但在乎好的教育理念如何推广到学校、家庭和社会更多地方。

羊城晚报:你指的是哪些理念?

张琳:比如,“把孩子当人看”。这句话可能很奇怪,但在各式教育中,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某种功利目的来评判你接受教育的成果,这个过程会忽略孩子的个性。问题来了!相比较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清华、北大重要,还是尊重个性的教育重要,这种讨论非常复杂。但是,“把孩子当人看”一定是个好的理念。

羊城晚报:在尊重个性方面,你还有哪些观察?

“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”

羊城晚报:你们是如何选出这三个主人公的?

张琳:我们摄制组驻扎在学校,最初进学校的两三个月时间,我们天天跟孩子对话,拍摄社团活动、“学生内阁”等显而易见的事。当时,我们确定要拍完全不同的孩子,想看看全新的理念和环境如何影响他们。我们最早定下周子其,就是因为第一集的第一场戏,他和李亮讨论军训与自由意志的关系。他太能折腾,口才又好,明显是一个在学校如鱼得水的孩子。

第二确定的是李文婷,当时学校里大多数是北京的孩子,他们对采访不陌生,但我们在人群中能一眼看到文婷的羞涩和怯懦,反差感很强。最晚确定的是陈楚乔,在我们不断的对谈中,陈楚乔的表达冷静、精准、真挚,几乎是赤裸地去谈论她是谁、她的困难和弱点,非常难得。

羊城晚报:听说你们做了看片会,这三个孩子当时在现场有什么反应?

张琳:他们的反应特别逗。我很清楚哪个孩子会在哪场戏出场,所以,播到那场戏时,我就去看他们的反应,发现每个人在自己的首次出场时都在摆脸,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很欣慰的是,虽然他们忘了很多当年事,但没有觉得那不是自己。他们也感到幸运,因为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。

羊城晚报:恐怕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见解也发生了变化吧?

张琳:片中呈现了很多学生、老师、校方之间辩论的场景,这种气氛非常宝贵。当时,关于学校的教育改革,大家有冲突,但可以商量、探讨。老师之间,老师、学生之间,甚至学生内部,有足够的容纳讨论和争议的空间。这一点,哪怕脱离这个故事,甚至脱离教育本身,也依然宝贵。

羊城晚报:这个学校的小小课堂对于中学教育而言,是不是有些理想化?

张琳:片子会有一点点误导。我们很自然地从创作角度出发,没有呈现学生上必修课等普通中学能看到的场景,的造成了一些误解——这是私立学校吗?这些孩子以后都出国吗?他们都是富二代吗?所有课都是8人小课堂吗?……显然不是的,片子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

“赢在起跑线,不如保有内驱力”

羊城晚报:跟着这场教育改革走过八年,你对于片中学生“赢在起跑线”这类说法,有怎样的理解?

张琳:观众能明显看到像周子其这样非常有才华和潜力的孩子,读到高三时就已经想“躺平”了。他们的确赢在了起跑线,但可能跑不动了。有些孩子没有赢在起跑线,按照正常轨迹成长,但由于一直有内驱力,只要给他一点机会,他就能百米冲刺,这不更好吗?

羊城晚报:当周子其高三出现躺平心态的时候,就你的观察,他之后是如何寻找内驱力的呢?

张琳:他的动力也没有消失过,就是对于历史的热情。但他受到了一些压力,父母是他为大学付账单的人,他没有抗争的动力。他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,在每个阶段都努力修正自己的位置,继续平衡目标和现实困难,比如,如何赚钱、找女朋友、达到父母的期望。

羊城晚报:这个过程应该挺痛苦的,因为要不断地修正自己?

张琳:是的。作为创作者,我曾对周子其有偏见,某个阶段,觉得他浪费了一身武艺,未能继续追寻梦想。但是,随着我自身成长,逐渐理解了他遇到的难题。对他来说,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能否快速实现理想。

羊城晚报:片子播出后,哪些反馈让你印象深刻?

张琳:由于我们把故事落到了人身上,以至于主人公当年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会引发一代代人去持续思考,唤起观众对校园青春的共鸣。如果说,《真实生长》是一部青春剧,我也不反驳,里面的确有非常好的青春故事,且比市面上多数青春剧更真实、鲜活,关于人在狂妄和惆怅之间的青春中,如何找到自己。

羊城晚报:你觉得他们找到自己了吗?

想,而是不要失掉内驱力。

我记得在他大学的最后一次采访时,他给自己新的修正道路是说要先去工作赚钱,40岁“退休”,找个地方教历史。

羊城晚报:他在很努力地寻找中的路。

张琳:他不会因为暂时找不到路而过分痛苦,这是一种进步和成长。他高考“考砸了”,分数不够父母期望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,就上了北大历史系。但很快,他发现自己关注现实的理念和北大的历史治学有冲突,同时,周围更为厉害的同学也给他造成了挫败感。他在大二时修正了道路,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,客观造成他在大学过得非常累。之后,他接着寻找折中道路,读了芝加哥大学的公共政策专业,用数学模型去解决现实问题,找到了这个阶段的最优解。但没想到,这两年遇到了疫情。所以,他的抱负可能还会经历一段过渡时期。

羊城晚报:“十一”模式有没有向全国高中推行的可能性?

张琳:它存在于全国的高中,不少试点中学推行了走班选课制度,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,也不够普及。它的确跟学校有没有资源去支撑这类教育模式也有关系。

“三个主人公的故事还会继续”

羊城晚报:你希望这部纪录片的受众是谁?

张琳:第一批受众一定是家长。其次,我特别希望正在经历青春期的下一代年轻人来看这部片子。故事中,主人公的成长环境、所思所想、鲜活面貌,是我很难在其他媒介作品中看到的。

羊城晚报:片子播出后,哪些反馈让你印象深刻?

张琳:由于我们把故事落到了人身上,以至于主人公当年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会引发一代代人去持续思考,唤起观众对校园青春的共鸣。如果说,《真实生长》是一部青春剧,我也不反驳,里面的确有非常好的青春故事,且比市面上多数青春剧更真实、鲜活,关于人在狂妄和惆怅之间的青春中,如何找到自己。

羊城晚报:你觉得他们找到自己了吗?

张琳:他们找到了自己,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万事大吉。虽然,他们在高中时代,能够清醒挖掘“我是一个怎样的人”的意识,比如陈楚乔已非常明确视创作为一生的事业,但并不意味着其今后的人生会非常光鲜。三位主人公都成长为珍贵的普通人,在走向大学、社会的过程中,会不断遇到挫折、修正自己。

羊城晚报: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片子,想到了经典纪录片《人生七年》,你们还会接着记录这三个主人公的故事吗?

张琳:一定会。我们也不排除在该项目之外,制作其他影片。我们现在依然跟拍他们。下次能够跟观众见面的故事,一定拥有完整的表达,是值得被提出的问题,被讲述的故事,而不会按照工作、结婚这类人生节点来建构主题。